文体与形名

——从作家排序之“自相矛盾”再探《文选》文体观

刘　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文选》的作家排序存在前后矛盾之处,一处甲在乙前,另一处则乙在甲前,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较难用“成于众手,编纂仓促”等原因来解释。“自相矛盾”的失序现象,多体现了编者希望将某篇作品安排为某类文体之“首篇”的用意。《文选》对文体之“首篇”的关注,与任昉《文章缘起》对“文章始”的标举,存在值得关注的联系。《文章缘起》对“文章始”的认识,弱化了对文体“六经之源”的推重,淡化了挚虞、刘勰文体观的形名学内涵,对魏晋以来的文体思想传统有很大变化。《文选》在神髓上接近《文章缘起》,突破了《文心雕龙》所代表性的传统文体观的束缚,又调整了任昉新的文体观的繁琐,因此其文体观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关键词:《文选》;排序矛盾;文体首篇;《文章缘起》;形名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5)05-0048-10

《文选》作为一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诗文总集,其文体思想丰富而深刻。如何理解《文选》文体思想与中古文体观演变的复杂联系,有关的研究有不少思考,本文则希望从《文选》作家排序“自相矛盾”这一现象入手,再探《文选》与《文章缘起》《文心雕龙》之关系,围绕形名学理论对中古文体论的影响及其变化,反思《文选》文体思想的独特价值,对其何以产生巨大历史影响的内在成因,作出一种解说。

一

《文选》的作家排序方式,萧统在《文选序》中有明确说明:“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然而,《文选》似未严格遵循时代先后之顺序,作家排列存在不少混乱之处。这一现象,受到古今学者的关注。王晓东、曹道衡、王立群诸先生对《文选》的“失序”之处,先后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并从《文选》取材前人总集、成于众手,编纂仓促而未能统一体例等角度,对失序原因作出解释。① 上述分析,立足对《文选》成书复杂过程的深入认识,很有说服力,但对于书中某一类特殊的“失序”现象,似乎还不能提供完满的解释,这就是《文选》作家排序的“自相矛盾”之处。

所谓“自相矛盾”,是指某些作家的排序,在《文选》内部即前后不同,一处为甲在乙前,而另一处则为乙在甲前,这涉及“曹植与王粲、刘桢”“曹植与王粲”“曹植与嵇康”“左思与陆机”“潘岳与陆机”“何

收稿日期:2015-03-18

作者简介:刘宁,女,江苏江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① 力之先生则认为“失序”是古籍编纂中的常见现象,非仓促成书所致。诸位先生的意见参见王晓东《〈文选〉系仓促成书说》,中国文选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文选学新论》,第 78—90 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曹道衡《试论〈文选〉对作家排序的编排》,《文学遗产》2003 年第 2 期;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第 50—97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力之《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彼此失照’问题:〈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关照”现象研究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劭与陆机”六组作家的相互关系。

	卷数、文体	作家排序	卷数、文类	作家排序
1	20 公宴诗	曹植在王粲、刘桢之前	23 赠答诗　29 杂诗	王粲、刘桢在曹植之前
2	23 哀伤诗	曹植在王粲之前	21 咏史诗	王粲在曹植之前
3	23 哀伤诗	嵇康在曹植之前	24 赠答诗	曹植在嵇康之前
4	22 招隐诗	左思在陆机之前	29 杂诗	陆机在左思之前
5	26 行旅诗	潘岳在陆机之前	16 哀伤赋、24 赠答诗	陆机在潘岳之前
6	24 赠答诗	何劭在陆机之前	29 杂诗	陆机在何劭之前

李善注曾指出《文选》六处排序失误之处,除枚乘《上书谏吴王》是依据“卒年”判定其误,其余都包含在上述例子中。

这些失序现象,当然也可以归因于编辑仓促、有失严密,但和《文选》其他“失序”现象相比,这样的解释,其说服力不免有所降低,因为不存在“自相矛盾”现象的“失序”,常常要依靠对作家生卒的精确掌握才能发现和调整,特别是对于时代相近的作家,要清晰厘定其次序,更需要细致地考订辨析。例如谢灵运与谢惠连,两者卒年一致,谢灵运生年早于谢惠连,应当排在谢惠连之前,但目前“赠答”“杂诗”两类中,二人的顺序都是谢惠连在谢灵运之前。这显然未能严格符合以时代为序的原则,但要发现这样的失误,无疑要求编纂工作比较深入仔细,在仓促的情况下恐难顾及。但上述“自相矛盾”的排序,似乎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考订工作即可知其误,而且多次出现,分布在九卷之中,也非轻易可以忽略者,《文选》的编者何以对其视而不见呢?

这种过于明显的“疏忽”,或许来自某种“有意为之”。不难发现,自相矛盾的失序,大多都与某一文体的“首篇”有关。

	卷数、文类	排序	文体首篇
1	20 公宴诗	曹植在王粲、刘桢之前	曹植《公宴诗》为“公宴诗”之首
2	23 赠答诗	王粲在曹植之前	王粲《赠蔡子笃》为“赠答诗”之首
3	21 咏史诗	王粲在曹植之前	王粲《咏史诗》为“咏史诗”之首
4	23 哀伤诗	嵇康在曹植之前	嵇康《幽愤诗》为“哀伤诗”之首
5	22 招隐诗	左思在陆机之前	左思《招隐诗》为“招隐诗”之首
6	26 行旅诗	潘岳在陆机之前	潘岳《河阳县作》为“行旅诗”之首

曹植的《公宴诗》和左思《招隐诗》都在作家时代排序失误的情况下成为“首篇”,而潘岳的《河阳县作》为“行旅”之首,位列陆机之前,这虽然与实际的潘、陆时代先后相吻合,但其中也很可能有某种有意地安排。在“哀伤赋”与“赠答诗”中,陆机都排在潘岳之前,这个错误的排序很可能出自《文选》所据以采录的总集,是一种比较流行的排序,而《文选》在“行旅”中,将潘岳置于陆机之前成为“首篇”,或许是编者对流行排序的调整。至于“赠答诗”以王粲《赠蔡子笃》为首,“咏史诗”以王粲《咏史诗》为首,王粲在曹植之前,这虽然符合王、曹二人的时代先后,但这里王、曹二人的排序,却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公宴诗”以曹植为首,曹在王粲之前,这个明显的失序,曾有学者将之归因于曹植的地位较高;但在“公宴诗”之后仅隔一卷出现的“咏史诗”、仅隔三卷出现的“赠答诗”,就以王粲居首,曹植居其后,这说明以曹植地位高而居首的排序方式没有被统一贯彻,如果说曹植的《公宴诗》成为“公宴诗”的首篇,有编者特别地用心,那么王粲居“咏史”“赠答”之首,虽然符合王、曹的时代排序,但也或许含有“首篇”的特殊意

义。嵇康《幽愤诗》居“哀伤诗”之首,情况有些特殊。“哀伤诗”分四言、五言两类,嵇康《幽愤诗》为四言,曹植《七哀诗》以下为五言,因此嵇康《幽愤诗》置于曹植之前,应是以之为四言哀伤诗之代表,与曹植以下五言哀伤诗相区别;在五言哀伤诗中,曹植又居王粲之前,按照前面的推测,此处曹植《七哀诗》似又被有意设定为五言哀伤诗的首篇。

在这些“自相矛盾”的失序例子之外,还有一个在“失序”的情况下成为“首篇”的例子,即卷 40 杨修《答临淄侯笺》为“笺”之首,而此卷中杨修在陈琳之前为“失序”。上述这些现象,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推测来解释,那就是《文选》的编者希望安排某些作家作品成为“首篇”,而“首篇”的选定,不是因作家本身地位高,而是因为这个“首篇”,对于其所属的文体来讲,带有某种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个重要意义该如何理解? 我们不妨观察曹植的《公宴诗》之于“公宴诗”,曹植的《七哀诗》之于五言“哀伤诗”,王粲《赠蔡子笃》之于“赠答诗”,潘岳的《河阳县作》之于“行旅诗”,杨修《答临淄侯笺》之于“笺”。这些作品都是该类文体的典范之作,同时也不难看到,因“失序”而成为“首篇”的作品,一般都是该类文体的早期之作,“失序”也是早期作品之间的错置甲乙,不存在将时代较晚的作品明显提升到“首篇”的情形,例如曹植与王粲、杨修与陈琳、嵇康与曹植、左思与陆机、潘岳与陆机。这说明,“首篇”不单纯是典范之作,更有明显的起始之义。例如曹植的《公宴诗》,与王粲的《公宴诗》对比,就会发现曹诗在命意、构思上多有创发之义: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①

而王粲的诗作则更多呼应酬和之意: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②

诗中“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正与曹植诗作中的“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有某种呼应之义。曹植的《公宴诗》对于“公宴诗”这一诗体来讲,更鲜明地具有“文体之始”的意味。

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那么可以说《文选》对各类文体的首篇,有着特殊的关注,如果不是“自相矛盾”的作家排序透露出蛛丝马迹,这种对“首篇”的特殊用心,就很难被发现。当然所谓“首篇”,并不拘泥为单篇作品,《文选》有时也将某一作家的一组作品设为文体之“首”,例如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为“咏怀诗”之首,古诗十九首为“杂诗”之首。这些成组的作品,其作为文体之起始的意义,和那些置于首篇位置的单篇作品是一样的。

二

《文选》对文体之“首篇”的关注,与任昉的文章学著作《文章缘起》对“文章始”的标举,不无接近之处。任昉《文章缘起》,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为《文章始》;在《宋史·艺文志》中才著录为《文章缘起》。《文章始》当是它最初的书名,其后在唐宋间流传时,书名变成《文章缘起》。《文章始》这个名称,很准确地反映了全书的立意与宗旨。任昉《文章缘起序》云:“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注:《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左传》叔向《贻子产书》,鲁哀

① 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943 页。
② 李善注:《文选》,第 943—944 页。

《孔子诔》,孔悝《鼎铭》,虞人箴)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着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凡八十五题①,以新好事者之目云尔。”②书中所著录的八十五种文体,只注明作为该种文体之“始”的一种作家作品,这些作品,对于该类文体具有始源的意义。这十分类似《文选》的文体“首篇”。

《文选》和《文章辨体》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学界对此讨论颇多,傅刚先生从《文选序》对文体的论列、文体排列顺序、作品选录等角度,观察两者之关系,认为《文选》与《文章缘起》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联,而与《文心雕龙》较为疏远。③ 本文认同傅刚先生的判断,而《文选》的文体首篇和《文章缘起》对“文章始”的重视,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进一步反映出两者的联系。

《文选》有三十九类文体④,《文章缘起》与之名称相同和基本相同者有三十二种,《文心雕龙》与之相同或接近者只有十九种,《文选》的文体分类,文体名称设置,似与《文章缘起》更为接近。《文章缘起》所选录的八十四篇“文章始”,有二十一篇亦被《文选》选录,而其中十三篇在《文选》中置于“首篇”位置。对文体之“始”的关注,以及对文体之“始”的篇目设定,《文选》和《文章缘起》呈现出某种近似性,而在这一点上,《文选》和《文心雕龙》则有明显的差异。这个现象对于理解《文选》的编纂特点及其文章学、文体学价值有何意义,还值得做进一步思考。这需要对《文章缘起》再做分析。

《文章缘起》求文章之“始”,这种对文体的溯源,并不是任昉的独创。魏晋以下的文体思考,都有自觉的溯源意识,但《文章缘起》从秦汉以下的文章创作实践中观察文章之“始”,则是一个非常重要变化。要理解这一变化,首先要分析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文心雕龙》这些早于《文章缘起》的著作的文体溯源意识。

无论是《文章流别论》,还是《文心雕龙》,对于文体之始的认识,都有着鲜明的“文源六经”看法,且着力从“六经”来追溯文章之始。例如挚虞论诗、颂之源,即推源于《诗经》:

> 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⑤

又如言“诔”之源起,又追溯到《左传》:“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

---

① 《文章缘起》的通行本作“八十四题”,吴承学、李晓红考证指出,《山堂考索》本、《事林广记》本皆为“八十五题”,王得臣《麈史》、王正德《余师录》皆明确记载“八十五题”,宋人所见本即如此,它本将“诏”“玺文”合为一条,以致不通。参见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文学遗产》2007 年第 4 期。本文所引用《文章缘起》之文本,皆据影印《山堂考索》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② 《文章缘起》,《山堂考索》本卷 21。杨赛认为注文部分的内容移为正文,是出于张绩之手,参见杨赛《〈文章缘起〉的真伪问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9 年第 2 期。

③ 傅刚先生的意见,见所著《〈昭明文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02—221 页。但力之先生则认为《文选》不可能受到《文章缘起》的影响,参见所著《〈文选〉不可能受到〈文章缘起〉的什么影响》,《湖北教育学院》2007 年第 11 期;本文认为,力之先生较多注意到《文选》与《文章缘起》的差异,因此《文选》是否直接继承《文章缘起》而来,的确需要更审慎的论证,但力之先生所注意到的差异,尚不能否定傅文对《文选》、《文章缘起》存在密切联系的论定。

④ 《文选》有“三十九类”文体,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 185—192 页。

⑤ 严可均:《全晋文》卷 7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905 页。

故作者多异焉,见于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①

《文心雕龙》对文体的思考,追求“原始以表末”,而这个“原始”,就体现为对文体的“六经”之源的追溯,在“论文叙笔”的二十篇中,这种溯源于六经的做法,贯穿在对各类文体的剖析之中。

《文章缘起》虽然在序言中也提到“六经素有歌、诗、书、诔、箴、铭之类”,并认为这是“文章名之始”,但这里对“六经”看法与挚虞与刘勰有所不同,挚、刘深入阐发后世文章对“六经”在内容实质上的继承,“六经”对于确立后世文章之“实”非常重要,甚至有规范的意义;而《文章缘起》则更多地认为后世文章对“六经”不过是袭用甚至借用其中出现的一些“名”,如“歌、诗、书、诔、箴、铭之类”,是“沿着以为文章名之始”,而其通过秦汉以下之作品来确立“文章之始”,则是强调后者在确立文体内涵实质上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文章缘起》对文章之始的具体论列,没有涉及“六经之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视后者,因为限于讨论“秦汉以后之文”的体例,它不可能论列先秦文章。② 事实上,《文章缘起》从秦汉以下作品来确立“文章始”的这一做法本身,就是淡化“文源六经”的体现。无论挚虞,还是刘勰,他们对秦汉以下文体创作的梳理,都没有将某一作家作品视为该体之始的自觉意识。对于他们而言,六经是规定后世文体内涵的终极榜样,而对于任昉来讲,这些作为“文章始”的作品,才是认识文体内涵的重要依据。《文章缘起》弱化了“六经之源”在文体认识中的重要意义。如果从魏晋以来文体观演进的基本理论基础来看,《文章缘起》对“六经之源”的弱化,有很重要的观念变化意义。

为什么挚虞和刘勰的文体观如此推重“六经之源”? 这并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一种经典崇拜,事实上作为魏晋南朝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学家,他们对“六经之源”的推重,有深刻的理论背景。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回到魏晋时代文体学、文章学其内在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的早期生成与演变,与名学理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先秦名家有丰富的思想创造,温公颐先生曾将先秦名家区分与“正名派”与“辩者派”。前者以儒家正名学说为代表,关注“名”对于伦理与社会规范的意义,后者以公孙龙和墨辩等为代表,关注辩论中判明是非的原则与法则,注重以“辩”判断是非。③ 战国中后期形成的黄老之学,吸收名学思考,建立了道、名、法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形名之学”。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与文化思考,儒家的正名思想,以及黄老的“形名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注重知识逻辑的公孙龙、墨辩一派的名学思考,其影响远不如前者巨大。中国早期文体观念的生成,与儒家的正名观念,以及黄老之学的形名观,其间的深刻联系就很值得关注。

东汉蔡邕《独断》中对 等文体的说明,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文体辨析:

> 策书。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策。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尺一木两行,唯此为异者。④

这一段对“策书”这种文体,从策的形制、书写方式、赐策的原因与对象等方面,做了说明。对“制书”的说明,则更详细:

> 制书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三公、赦令、赎令之属是也。刺史、太守相弹劾,申下土,迁文书,亦如之。其征为九卿,若迁京师近臣,则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无姓。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印重封。唯赦令、赎令,召三公诣朝堂受制书。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⑤

---

① 严可均:《全晋文》,卷 77。

② 吴承学、李晓红:《任昉〈文章缘起〉考论》,《文学遗产》2007 年第 4 期;朱迎平:《〈文章缘起〉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 年第 6 期。

③ 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前言第 4—5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④ 《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3 页。

⑤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3—4 页。

这是一段关于“制书”的文体说明,对“制书”所包含的次文体的种类、适用的对象、书写形式、符印玺封的方式、传布方式都一一做了交代。

《独断》还有对认识讹误的辨析,但十分简略:

> 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①

蔡邕这些文体说明,在今天看来只是一些详细的说明文字,但其含义并非如此简单。《独断》上述内容,乃沿袭其师胡广《汉制度》中的有关记载,《后汉书》卷九十四《礼仪志上》李贤注引谢沈《后汉书》云:“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谯周后改定《礼仪志》。”②可见,胡广所记是“立汉制度”,对诏书、策书、制书、戒敕的定性说明,其实是有着立制度、正名号的用心。因此,蔡邕《独断》这一早期的文体记载,与儒家的“正名”思想有密切的联系。孔子认为“正名”是为了“正政”,“正名”即是以名正实,用“名”所规定的内容去规范现实。荀子继承这一思想,提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③,虽然荀子构筑了由名、辞、辩说所组成的一整套正名逻辑,但这套逻辑的核心是对“名”的规定与说明,而辩说讨论只有在靠说明不足以把握“名”之内涵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因此,在儒家的“正名”传统中,“辩”并不占有重要位置。蔡邕《独断》对文体重在说明,而少有辩正然否的内容,就带有鲜明的“正名”特点。

如果把蔡邕《独断》对文体的说明,与《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作一个对比,其间的差异不可谓不巨大。在“论文叙笔”的二十篇文体论中,刘勰的讨论已经远远不是单纯的说明与介绍,其《序志》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非常全面地概括了《文心雕龙》文体论的观察角度和论述格局,其间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通过“释名”、“敷理”来阐释文体的内涵;其二,通过“原始”与“举统”来观察文体的源流演变;其三,通过“选文以定篇”来讨论历代创作得失。在对每一类文体的论述中,刘勰都基本综合了这三方面的内容,例如同样是讨论“诏策”,《文心雕龙·诏策》在对诏策体制特点有更详细说明:

>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同时《诏策》还显著增加了对历代创作得失的分析:

>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新,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安和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

当然,对文体源流的深入细密的揭示也是引人注目的内容:

> 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

---

① 《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4 页。

② 对于《独断》的体制、内容、渊源,刘跃进先生有全面的研究,关于《独断》与《汉制度》之关系,亦有深入讨论,参见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秦汉文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146—171 页。

③ 王先谦集解:《荀子集解》,《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275 页。

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

如果说《文心雕龙》的“释名”与“敷理”,还多少可以看到儒家“正名”思想的影子,那么它在观察文体源流、辨析历代创作得失上所表现出的浓厚的兴趣,则已经显露出与儒家之“正名”颇为不同的名学内涵,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不关注黄老之学形名思想的深刻影响。《文心雕龙》的文体思想与名学传统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更为贴切的认识。

魏晋时期,人们对“名”的思考,重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这一时期的“名学”思考虽有丰富的内涵,继承了不同的名学传统,但其中来自黄老形名之学的影响非常值得关注。黄老之学形成于战国晚期,在当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蒙文通先生称为“黄老独盛,压倒百家”。① 黄老之学在道法结合的格局中,对战国思想进行总结,而“名”则是黄老之学极为关注的问题。《尹文子·大道上》云:“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②“形”谓有形的具体事物,“名”是具体事物的名称。任何有形之物,皆生于道,皆有其相应之名。“形”与“名”皆是自然之道的体现,通过审察“形”“名”,确立符合自然之道的“正名”与“恒形”,就确立了是非标准,就可以进而推行法治。如此,“道”“名”“法”三 者得以贯通。可见,黄老之学所注重的审察形名,是立足自然之道,对“恒形”“正名”的追求,对事物终始之迹的观察是确立“恒形”“正名”的重要手段,而“恒形”、“正名”确立之后,又可以说明人们认识“福祸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经法》云: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 = 名 = (形 = 名 = —形名)巳(已)定,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是故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经法·论约》)③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见正循理,能与(举)曲(曲)直,能与(举)冬(终)始。故能循名廄(究)理,刑名出声 = (声,声)实调合,祸〈福〉材(灾)废立,如景(影)之隋(随)刑(刑—形),如向(响)之隋(随)声,如衡之不臧(藏)重与轻。(《经法·名理》)

这种通过观察事物自然终始之变化来审察“形”、“名”,是黄老形名学的重要特点,《文心雕龙》在文体辨析中对追源溯流的浓厚兴趣,正体现出与黄老形名的学的显著关联。“文体”之名,只有在详查其终始变化的过程中,才能确立“恒形”与“正名”,才能确立判定是非,历观得失的标准。因此,《文心雕龙》对文体源流的探究,不是简单的知识兴趣,而是有深刻的思想需要。

至于《文心雕龙》对历代创作得失的讨论,则更多地体现出“循名责实”的名学追求。《邓析子·转辞》:“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④按照名去寻绎相应的实,就可以认识这类实的全貌。循名责实,强调“名”“实”的相应。黄老之学也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强调“名”“实”相应,“名者,圣人所以记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执其名,务其应,所以成之应之道也”(《管子·心术》)。“物固有形,形固有名,此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管子·心术》)⑤“名功相抱(孚),是故长久。名功不相抱(孚),名进实退,是谓失道”(《经法·四度》)。魏晋时期兴盛的人物品评,以观察名实关系为核心,而对人物名实的认识,也是以自然为本,因此与黄老形名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以此人物品评为基础推行九品中正制,正是“名”“法”相合的黄老形名的特点所在。学界都注意到魏晋时期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

---

① 蒙文通:《略论黄老学》,《蒙文通文集》第 1 卷《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 1987 年版,第 276 页。

② 王恺銮:《尹文子校正》,《民国丛书》,上海:上海书店 1996 年版,第 1 页。

③ 文中《经法》文本,据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简帛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关于《黄帝四经》中“名”的含义,本文参考了曹峰先生的分析,参加所著《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版社 2015 年版,第 410—411 页。

④ 王恺銮:《邓析子校正》,《民国丛书》本,上海:上海书店 1996 年版,第 11 页。

⑤ 黎翔凤:《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第 771—776 页。

赋》对文体特性、作家才性的讨论,与魏晋人物品评多有近似,而这说明魏晋文体观,对文体名实的观察,也可以看到来自黄老形名思想的影响。《文心雕龙》历论创作得失,循名责实,与黄老形名之学的内在联系同样值得关注。①

在观察了《文心雕龙》与黄老形名学的多重联系之后,可以再观察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其对文体源流的关注,对文体内涵的辨析,与《文心雕龙》文体分析法多有近似。或许可以这样讲,从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到刘勰《文心雕龙》,魏晋以下日益兴起和充实的文体讨论,都与黄老形名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文心雕龙》对黄老形名学的理论内涵,做了最为充分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其文体观独特的理论构架。

从这个黄老形名学的思想结构,就可以对"文源六经"之说何以深刻影响挚虞、刘勰的文体论,做出理论上的解释。在黄老形名学中,"名"出于"道",审察"形"、"名",要历观事物终始,以"道"为本。黄老之学在西汉以后亦有重要影响,而其在西汉之后的重要变化,就是儒、道融合,作为世界之根本的"道",和儒家的伦理结合起来。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从天道的角度,确立儒家伦理原则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儒学与黄老之学的融合,在《文心雕龙》中,就表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文原于自然之"道",而儒家经典则是"道"的最典范的体现。因此,"文源六经",其内涵就是"文源于道"。"六经之源"之所以在文体讨论中不可违背、不可忽视,就因为"道"不可违背,"六经"作为"道"的体现,是所有文体成立的前提与基础。与黄老形名学深具关联的理论结构不被消解,"文源六经"的观念在文体认知中就始终会有重要影响。

三

在这样一个文体观发展的背景下,任昉《文章缘起》对"文源六经"的淡化,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六经之源"在文体实际认知中的退场,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观念的退场,更意味着传统文体学的理论基础和思维结构发生重要的改变,特别是黄老形名学对文体认知的理论影响趋于弱化。在黄老形名学影响下发展的文体讨论,会形成一些观察文体的模式,如探寻源流、审核名实,辨析功能,但文体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本身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灵活的变化,朱光潜先生就曾指出"搜罗古佚的办法永远不会寻出诗的起源","诗的起源实在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② 这就指出了探寻源流之方法的局限。任昉列举了八十五种文体③,随缘立名,虽然繁琐,但表现出文体分类上灵活而开放的态度,以及立足更丰富的功能和表达特色去认识文体的追求,这就为文体认知的新角度、新方式打开探索的大门。任昉对魏晋以来文体学传统的突破,或许与佛教的影响不无关系。佛教对"名"的认识十分复杂,章太炎的《原名》,综合古代名学传统对"名"进行阐释,其中从佛教唯识的角度,对"名"的形成进行了概要的说明:"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领纳之谓受,受非爱憎不着。取像之谓想,想非呼召不征。造作之谓思,思非动变不形。……接于五官曰受,受者谓之当簿;传于心曰想,想者谓之征知;一接焉一传焉曰缘。凡缘有四。增上缘者,谓之缘耳知声、缘目知形。此名之所以成也。"④这很精要地说明了佛教对"名"的认识。可见,佛教论"名",以缘起性空为要。黄老形名以"道"为根本,名实

---

① 杨清之从校练名理的角度讨论了形名学对刘勰的影响,本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杨文有所不同,杨氏意见参加所著《形名学的复兴与刘勰的论文叙笔》,《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② 朱光潜:《诗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 页。

③ 《文章缘起》的八十五种文体,应当包含张绩补撰的内容,朱迎平先生认为:经张绩所补的《文章始》应仍保存了任昉原作的大部分。参考朱先生的意见,本文认为,《文章缘起》的文体数量多,也多有琐细之处,例如"表"分"表"与"让表",复有"谢恩"一体,都过于琐细,整体来看,《文章缘起》的文体分类是比较繁琐的。朱迎平先生的意见,参见所著《〈文章缘起〉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6 年第 6 期。

④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 页。

辨析中对“实”的执着,这都是佛教破除的对象。

根据史书目录的记载,《文章缘起》最初名《文章始》,在唐宋流传间被称为《文章缘起》,但这个名称带有鲜明的佛教意味,“缘起”正是佛教所理解的“名”所成立的依据。限于材料,我们对佛教之于任昉文体观的影响,只能推论至此,但有一个后世的例子,可以提供一个参照。南宋诗论家严羽深受佛教影响,在《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深有发明,而他在《沧浪诗话》中对“诗体”的讨论,同样不循故辙,独辟蹊径,其文云:

> 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
>
> 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
>
> 又有所谓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①

这样的诗体区分,因过于繁琐,在严羽之后并未广泛流行,但对于严羽来讲,则体现了突破诗体讨论传统,对诗体之丰富做充分把握的努力。深受佛教影响的严羽对诗体的这种认识,似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促使我们思考任昉的文体观是否与佛教的影响有某种联系。

《文章缘起》对魏晋以来深着形名色彩的文体观的重要改变,对于理解《文选》的文体观无疑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文体之“首”与文章之“始”的关注,以及从秦汉以下文章来确立文章之“始”的做法,是《文选》在神髓上更接近《文章缘起》的体现。任昉在对文章之“始”的独特确立中,淡化了他自己在序言中对“六经之源”的标示,体现出对魏晋南朝文体观的变化。《文选》同《文章缘起》一样,也在序言中保留了对“六经之源”的尊重:

> 诗者,盖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桑间》、《濮上》,亡国之音表。故《风》《雅》之道,粲然可观。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颂者,所以游扬德业,褒赞成功。吉甫有“穆若”之谈,季子有“至矣”之叹。舒布为诗,既言如彼,总成为颂,又亦若此。次则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弼匡,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②

但这些对“六经之源”的追溯,在《文选》具体的文体分类和篇目设定中,基本只是一个虚悬的背景。《文选》的文体首篇,立足秦汉以下的创作实际,勾勒了文章之“始”,这与《文章缘起》十分接近,也因为这一点,《文选》像《文章缘起》一样,相对于《文心雕龙》所代表的魏晋以来的流行文体观,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萧统在《文选序》中以发展变化的观点表达了对“文”的认识:

>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③

这种对“文”“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的变化特点的肯定,表明《文选》更为看重六经之后“文”的发展变化,这种实际上的关注重心,也许就决定了《文选》更加接近《文章缘起》,而不是《文心雕龙》。

---

① 严羽著、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2—69 页。

② 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

③ 李善注:《文选》,第 1 页。

《文选》和《文章缘起》的关系,对于理解《文选》何以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前所述,《文章缘起》并非一部寻常的文章学著作,它呈现出对魏晋以来文体观的重要变化,它打破了传统文体观认识文体的框架与模式,以更开放灵活的方法面对文章的创作实际,其文体总结也许更加贴近文章之实。《文选》在采用与《文章缘起》类似的文体认识框架的同时,又对其加以规范和集中,因此《文选》既突破了《文心雕龙》所代表性的传统文体观的束缚,又调整了任昉新的文体观在认知中的繁琐①,其文体分类与选篇能更好地反映文章创作的实际,而文体体系又不失规范,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典范意义。这一点也很类似严羽诗体思想的命运。严羽论诗体虽然很繁碎,但他从人、时代等角度来讨论文体的方式,对于反映唐宋诗歌的创作特点,很有帮助,因此在明清的诗体讨论中,严羽的诗体思想就在精炼与规范的前提下,成为被普遍接受的一些诗体认知。如果说对严羽的规范与精练,出现在明清时期,那么任昉《文章缘起》则是在同时代就遇到了《文选》,《文选》取其新意而加以调整,因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当然,由于传世文献有限,《文选》和《文章缘起》的关系,很多还只能是一种推测。《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二十七部文章总集,除《文选》外,都已亡佚。魏晋南朝时期编纂的文章总集,其面貌十分模糊,《文章缘起》这种特色的文章学著作是否还有其他,如今已不得而知。因此,本文只是从《文章缘起》的"文章始"观念所打开的视角着眼,就《文选》《文章缘起》《文心雕龙》等书所呈现的文体观来进行分析,围绕形名学与中古文体论的关系,观察其理论内涵的异同变化,期望能由此对《文选》的文体观特点、文章学格局以及它何以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作出一些新的思考。

Genre and Form-Name: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tylistic Ideas of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adictions in its Arrangement of Author Order

Liu N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re exist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arrangement of author order in Xiao Tong's (萧统)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文选》). It was not caused by a hasty and messy compilation, but by the intention to arrange the "first piece of classic work" for a genre .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ao Tong's concern for the first piece of classic work for a genre in his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and Ren Fang's (任昉) arrangement of the first piece of classic work for a genre in his *On the First Piece of Classic Work for Various Genres* (《文章缘起》). Ren Fang's arrangement thought lowly of the idea that *the Six Classics* (《六经》) were the origin of various genres, and laid less empha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physical-nominal doctrine reflected in Zhi Yu's (挚虞) and Liu Xie's (刘勰) stylistic view, thus bringing about great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 of stylistic thinking after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Xiao Tong's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was in essence close to Ren Fang's *On the First Piece of Classic Work for Various Genres*, broke through the control of the traditional stylistic view represented by Liu Xie's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文心雕龙》), and adjusted the complicity of Ren Fang's new stylistic view.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stylistic ideas of Xiao Tong's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made such significant influence in history.

Key words: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文选》), contradiction in the arrangement of author order, first piece of classic work, *On the First Piece of Classic Work for Various Genres* (《文章缘起》), form-nam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按照朱迎平先生的观点,《文章缘起》的八十五种文体,其大部分为任昉原作,因此《文选》的三十九种文体,相较于《文章缘起》其数量应少了许多,见所著《〈文章缘起〉考辨》。